

《秦晋豫新出土墓志搜佚三编》（以下简称《三编》）共收录从汉至民国间碑志九百一十二种。其中，汉代十四种，晋三十八种，北魏并东西魏三十九种，北齐、北周三十四种，隋二十种，唐六百九十种，五代五种，宋五十四种，金、元十二种，明、清、民国九种。这批碑志具有重要的史料、文学和书法艺术价值。

一、史料价值

《三编》中，史料价值之大者，首先在于二〇〇八年五六月间，洛阳市偃师、孟津两县交界处的邙山之上出土了一批晋武帝（司马炎）泰始年间的皇宫奴婢砖铭。此砖铭内容涉及西晋时期的官奴制度及鲜卑、羌等民族衍化资料，与洛阳出土东汉刑徒砖参照可知，西晋官奴砖的出土对西晋历史及丧葬文化具有珍贵的标本价值。其如，据《辞源》“官婢”条释：“女子有罪而没于官者也。汉女子缇萦上书，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罪。”《辍耕录》以古称为官婢，亦曰官奴，本书收录“官鲜卑砖”，盖官家没入官之婢女。“奚官羌婢砖”，《礼记》疏曰：“有才能曰奚。无才能曰奴。”《周礼·天官·冢宰》：“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官三百人。”郑玄注：“古者从坐男女，没入县官为奴，其少才知为奚，今之侍史、官婢；或曰：奚，宦女。”因此“奚官奴”，即具有一定技能的女婢，称为“奚官奴”，身份与其它“官婢”有别，可能属于“乐妓”婢。“官虏婢”，《说文》：“虏，获也，从田从力，虍声。”其义有四：一曰俘获。《说文·毋部》“虍，获也”。《晋书·孙思传》：“乃虏男女二十余万口，一时逃入海。”二曰抢劫、掠夺。《方言》卷十二：“虏，钞，强也。”郭璞注：“强取物也”。《史记·韩长孺列传》：“匈奴虏略千余人及畜产而去”。三曰战俘。《汉书·樊哙传》“西至郿，以却敌，斩首十四级，捕虏四十人，赐重封。”颜师古注：“生获曰虏”。于此可知，“官虏婢”者，当为战争俘虏而入官之奴婢。

《三编》收录北魏及东西两魏资料可资补正史书。

在六朝的墓志中，涉及佛教的墓志亦是一个极有必要议及的话题。本书所收葬于北齐的《刘集墓志》即为最好注脚。志云：“尼讳集，俗姓刘，冀州人。年十二出家，舍副笄之饬，袭多罗之衣。……大魏理运，道冠前王，像法之兴，于斯方盛。时年廿五，魏宣武帝元恪所宠，为官讲法师，文宣大寺主，化缘有限，幻梦难停，春秋九十二，以武平元年岁在庚寅十月四日迁神于邺都。”亦足可见佛教当时盛行之一斑。

北周时期，国祚短暂，仅存二十二年。然在“四海版荡，天下离乱”之时，国家史料多有缺失。惟墓志中，有史料之价值者多有存焉，其如本书所收葬于隋开皇十八年的《田集墓志》，记录北周初年战争事云：“君禀灵纯粹，降神惟岳。……新羁之锐，掩日浮云；执镜之徒，跨山凭谷。公焚舟偃帟，亲执短兵。握节不移，温序之情弥厉；裹尸而反，文渊之志已申。……”志主田集先随周太祖宇文觉战窦泰，宠迈式车之礼，恩深赐帐之荣。旋随太祖武元皇帝宇文邕，率五侯之众，搃七萃之师。骋貔貅于商郊，扫鲸鲵于朔野，亲执短兵。握节不移。直至薨于戎幕，死而后已。实可以“名藏石室，誓山河而永固；功宣金版，传世祀而无穷”。惜北周史书无载，当以此补之。

唐墓志中，可补史者甚多，今撮取一二，聊以述之。唐韩休撰文之《许景先墓志》可补典籍者有三：首先，韩休撰此志文《全唐文》失载，可籍此以补。其次，志主许景先之世系，两唐书失载，而志载“君讳杲，字景先，高阳人也。……曾祖绪，散骑常侍。祖行师，潞州别驾。父义均，秋浦令、赠左司郎中”。此二者，两唐书失载当补。

唐《牛惟彦墓志》，志主所历事迹，事涉“安史之乱”，诸多细节多可补足史籍。与史可补杨贵妃之世系者，尚有《杨珙墓志》。《旧唐书》载：“玄宗杨贵妃，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玄琰，蜀州司户。妃早孤，养于叔父河南府士曹玄璈。……妃父玄琰，累赠太尉、齐国公；母封凉国夫人；叔玄珪，光禄卿。”而《杨珙墓志》载：“珙字倬，四代祖汪，隋银青光禄大夫、刑部尚书。尚书库部郎中志谦之曾孙。陈留郡太守令本之孙。工部尚书玄珪之第十子也。”史志相较，可知杨贵妃高祖杨令本之上，尚有令本之父杨志谦与令本之祖杨

汪。杨贵妃同辈中，尚有叔叔玄珪之子杨珙。可补其世系阙如。

中晚唐墓志中，唐穆宗李恒时德州刺史、御史中丞、横海郡节度副使王稷二子《王朝郎墓志》《王崔五墓志》，事涉王稷冤案具体时日及殃及子女惨状，史籍失载，亦以当补。王稷其人，两唐书无传。其事迹载附其父王锒传后。《旧唐书·王锒传》载：“子稷，历官鸿胪少卿。锒在藩镇，稷尝留京师，以家财奉权要，视官高下以进赂，不待白其父而行之。广治第宅，尝奏请藉坊以益之，作复垣洞穴，实金钱于其中。贵官清品，溺其赏宴而游，不憚清议。及父卒，为奴所告稷换锒遣表，隐没所进钱物。上令鞠其奴于内仗，又发中使就东都验责其家财。宰臣裴度苦谏，于是罢其使而杀奴。稷长庆二年为德州刺史，广费金宝仆妾以行。节度使李全略利其货而图之，故致本州岛军乱，杀稷，其室女为全略所虏，以妓媵处之。”

关于李全略其人，《旧唐书·李全略传》载：“李全略者，本姓王，名日简。为镇州小将，事王武俊。元和中，节度使王承宗没，军情不安，自拔归朝，授代州刺史。及长庆初，镇州军乱，杀田弘正，穆宗为之盱食，以日简尝为镇将，召问其计。日简遂于御前极言利害，兼愿有以自效，因授德州刺史，经略其事。明年，擢拜横海军节度使，赐姓李氏，名全略，以崇树之。未几，令子同捷入侍，兼进钱千万。逾岁，同捷归觐，乃奏请授沧州长史、知州事，兼主中军兵马。朝廷初不之许。后虑其有奇策，将副经略之旨，遂从之。及得请，全略乃阴结军士，潜为久计，外示忠顺，内蓄奸谋。棣州刺史王稷善抚众，且得其心，全略忌而杀之，仍孥戮其属。”志载与史载相若，唯王稷任“德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一职，两唐书失载。另据《王朝郎墓志》载，王稷蒙冤受难具体时日在“长庆二年九月八日”。时王稷三子朝郎十六岁，《王崔五墓志》载王稷四子崔五十四岁。《旧唐书·王锒传》后附载“稷男叔泰，时年五岁，郡人宋忠献匿之获免，乃收养之，今已成长”，应为王稷第五子。王稷长子、次子失载，是否同时遇害，亦未可知。王稷明可照奸，忠能奉主。而奸能擅权，妒能图财，千古忠臣之悲也。

二、文学价值

以新出土金石文献补正其史实。本书所收涉及文学之史料中，可资证者，以多可陈述。

隋代以降，以儒学闻名传世者，包恺可称一人。包恺《隋书》有传，然文过简略，仅七十余字，实不足以传千秋而闻四海。而《包恺墓志》，所述史实甚详。志文所叙包恺行状甚详，当补史阙。

在文学方面，本书收录唐《王积薪墓志》应为唐文学方面的一个亮点。志主王积薪，两唐书无传。而传之甚奇者，殆为他是唯一有据可查的围棋国手。据《新唐书·艺文志》载：“王积薪《金谷园九局图》一卷。开元待招。”其传事迹于后世者，著作有唐李肇《唐国史补》、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唐冯翊之《桂苑丛谈》、唐冯贽《云仙散记》、唐薛用弱《集异记》、宋曾慥《类说》、宋李昉《太平广记》等书。然上述诸书所叙者，多是棋艺高超之传奇。其一，成为“棋待招”之缘由，《酉阳杂俎》载开元年间，王积薪曾在丞相张说家住过一段时间，在那里和一行和尚下过棋。王积薪自知棋力不差，不久便去投考翰林。果然一战告捷，成为“棋待招”。其二，薛用弱《集异记》载王积薪随玄宗西狩，途遇异人老姬，棋艺大进事。《集异记》载：

元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围棋者王积薪从焉。蜀道隘狭，每行旅止息中道之邮亭，人舍多为尊官有力者之所见占，积薪栖无所入，因沿溪深远，寓宿于山中孤姥之家，但有妇姑，止给水火。才暝，妇姑皆阖户而休，积薪栖于檐下，夜阑不寐。忽闻室内姑谓妇曰：“良宵无以为适，与子围棋一赌可乎？”妇曰：“诺。”积薪私心奇之，况堂内素无灯烛，又妇姑各处东西室，积薪乃附耳门扉。俄闻妇曰：“起东五南九置子矣。”姑应曰：“东五南十二置子矣。”妇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应曰：“西九南十置子矣。”

每置一子，皆良久思维，夜将尽四更，积薪一一密记其下，止三十六。忽闻姑曰：“子已败矣，吾止胜九枰矣。”妇亦甘焉。积薪迟明具衣冠请问，孤姥曰：“尔可率己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积薪即出囊中局，尽平生之秘妙而布子，未及十数，孤姥顾谓妇曰：“是子可教以常势耳！”妇乃指示攻守杀夺救应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积薪即更求其说。孤姥笑曰：“止此已无敌于人间矣！”积薪虔谢而别，行十数步，再诣则已失向之室闾矣。

自是积薪之艺，绝无其伦。即布所记姑妇对敌之势，罄竭心力，较其九枰之胜，终不能得也。因名《邓艾开蜀势》，至今棋图有焉，而世人终莫得而解矣。

以上诸书所载多道听途说，难以凭信。其至为可信者，殆为唐代文部常选韦宁撰文、武部常选李景顺刻字之《王积薪墓志》。志载：“公讳积薪，字积薪，其先琅琊临沂人也。自着族之后，数百年来，唯有一簣而已。……幼有沉思，雅量多能。故当圣母临朝，年才童仆，便以手谈供奉始于殿中直。……且公烂柯之术，既为第一；悬针之妙，道号无双。外域每进善棋者，自谓绝伦，及见公举一子，靡不阁手卷舌，终身不敢言棋。兼及翰林群英，多术墨妙，覩公之札一帖，咸以为右军不死，太尉复生。其情致如此者！复妙长行，尤工弹棋。观夫背局，教移胜负悬定。葛巾轻拂，巧势如云。又为天下所称，谈不容口。至于投壶一妙，此复旷古未闻，当今独有。当壶中实豆，堂上布筵，取口剑之双骄，争筹算之多马，莫不节谐鲁鼓，心谓秦人。彼数骄者自疲，而我中何极！嗟夫，非天下至蹟，其孰能预于兹？而赋命不厌，罹此凶乱。自上皇西幸，巨猾东喧，公涔涔益泣，切切私谋，力不能肆，生何用久。乃饮恨卒于洛阳明教里之私第，时春秋有六十。呜呼哀哉！国宝云亡，邻春亦罢；哲人逝矣，何痛如之！祠子琇、璿等，哀哀断骨，桀桀灼心，奉迁神柩于长安城南凤栖原。十一月十八日，祔大莹，礼也。”于此可知，王积薪童仆之年，便以手谈供奉，始于殿中直。不仅围棋下的好，而且书法亦极精妙。其他如弹棋、投壶等诸多技艺，莫不精湛。其棋艺精进与玄宗西狩毫无关系。志载玄宗西狩时，王积薪尚在洛阳，闻“上皇西幸，巨猾东喧，公涔涔益泣，切切私谋，力不能肆”，报国无门，乃饮恨而卒。一代围棋国手，亦仅能如此报国而已也。

唐丁元裕撰序、礼部尚书许国公为铭的唐集州刺史《丁元裕志石文》，载志主孝和中兴书玉册，抄御诗，叙録特进之事，多可补足史籍，亦理应提及。志主丁元裕，集州刺史，两唐书无传，《唐刺史考全编》失载。志载：“公讳元裕，字俭，清河人也。……祖信，皇朝连州刺史、恒安公。父仁静，皇朝海州怀仁县令。……公虽能文，鄙而鲜作，故有集两轴，以始于后。”夫公文则书法精妙，文辞详瞻，侍奉春宫，缮写揽美；武则刺守一方，恩威并施，声明朗朗。史籍不载，何以传芳。至于诸如他人有专文研究论及的《大周圣神皇帝册封魏王诏》、以及韩休撰文的《杨嬉墓志》、达奚珣撰文的《寇氏墓志》、杨綰撰文的《唐故赠昭靖太子李邕墓志》、李纾撰文的代宗相国《元载墓志》、韦肇撰文的唐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杨綰墓志》、唐丞相、梁司空致仕赠司徒乐安《孙偃墓志》，皆文史兼备，就不在此一一赘述。

三、书法艺术价值

中国书法之研究，向以历史文献为经，以地下出土金石文献为纬，往返交织，得其锦绣。

在本书所收汉魏六朝的墓志中，可以看出其时的书法经历了两个特殊的阶段。故这些碑志书法，亦当为该书的一大重点。其一，为篆隶转变阶段。夫汉魏之书法，多以篆隶书法行世，尤其曹魏以后，篆书逐渐退出书写主位，代之以隶书行世。本书所录汉代砖文十四种，每品砖文极富个性，脱尽时尚书法呆板气息，代之以起的是用笔之潇散有致而清新，开张姿肆而中矩。其二，北魏书法承上以启下，处在隶楷转变的特殊阶段。书中所录北魏至隋的七十三品碑志中，其书法风格，形式多变，异彩纷呈。诸如北魏城阳王《元忠墓志》，该志碑形，上额阳刻“魏故城阳王墓志”，篆书笔法取三国吴《天发神讖碑》的倒薤形，但体势略方，较之北魏早期的《皇帝南巡之碑》虽粗略了些，但此亦多了一些雄强本色。该志文书法，是北魏晚起铭刻书迹中的一件佳作，具有典型的北魏铭刻楷书体势右昂，点画方截，结构开

张，章法茂密的特点。该志的方笔取胜，朴茂厚重，可为楷则。北魏广阳靖公《王埏奴墓志》，同是志呈碑形，形体巨大，高108厘米。文字结体严谨而宽博，字势开张，笔法于厚重中见飘逸。北魏《程暉墓志》，书法极似广为书界称道的龟形《元显儁墓志》，结体严整紧密，笔法爽洁峻利，字体风神秀韵，奇逸多姿。特别是该志书法的俊秀丰美，不是俗人眼中的秀和美，而是超凡脱俗的秀和超凡脱俗的美。它字态的宽博雍容，是君子的端方步履，而非豪绅的富贵之态。又如北魏《吕达墓志》，书法尚存篆隶逸韵，其章法虽横竖成行，体势方整，多取左低右高之势，如此错落有致，没有丝毫呆板之感。如第一行的“故”字，倾斜角度大产生欹斜之势，但“口”紧紧压住左下角的重心，看似岌岌可危，其实却纹丝不动，这种动中求稳的字态正是魏书奇趣之处。此志用笔粗细变化，但起止方圆兼备，横划多往右上倾斜，竖划以中锋为主；捺笔以侧锋出，撇捺开张，为结字增添率意之感；点的变化较大，有圆点，如第四行的“极”字。亦有方点，如第七行的“尚”字，势依字形顺势而成。其结字虽形态各异，但随意中可见统一，其大多中宫紧缩，重心置于中间，通篇显得既端正严谨又舒朗开放，不失为一方佳品。

其他如，北魏《冯聿墓志》、《元遵墓志》、《贺收墓志》、《李瞻墓志》、《王扬墓志》、《路宁墓志》、《宇文旭墓志》、《奚融墓志》、《平原武昭王元祉墓志》，东魏《辛巨墓志》以及北齐书法中宽博雍容的圆笔楷书，记述高欢两位少亡兄弟的《高宝墓志》、《高贵墓志》、《尉茂墓志》、尉茂之妻《皇帝第四女高氏墓志》、《慕容苌墓志》、《穆瑜墓志》、《王炽墓志》、《李子叔墓志》、《赵乐子墓志》等等不一而足，皆为宝贵的书法数据。

唐代重书学。书家之盛，虽不能非议。而名传千年者易，而书迹传千载者罕。现所论及者，诸如张怀环、宋儋、薛嵩、马儋诸人。书法典籍有所论及，书法成就风格之属可觅，而真迹却难得一见。《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载：“张怀环，唐海陵（今江苏泰州）人怀瓘弟。兄弟并翰林待诏。怀环官至翰林集贤两院侍书侍读学士。怀环书大小篆、八分。怀瓘书真行草，合成六体。怀环有文学，尤善草隶。”今怀环书皆难见，今所收录署名“朝请郎监察御史里行”吴玘撰，前直秘书、别敕留集贤院供奉张怀环书《唐故大中大夫使持节沁州诸军事守沁州刺史致仕上柱国李登墓志并序》，正可补阙，以向时人同观。

唐代书学之盛，不减于晋，然皆家传世习，自易为工。故载诸书史者虽众，然文字多简，后人难以传习。其如《书史会要》载唐代书法家沈从道，仅云：“师虞颇有体势”，其他历史信息皆无。今地不爱宝，《沈从道墓志》出土于洛阳，据志可知沈从道不仅“师虞颇有体势”，更为虞家之东床快婿。

第三，唐内作将官马瞻，以善刻碑闻名于世。曾刻《唐张延赏碑》、《唐赠尚书左仆射嗣曹王故妃荥阳郑氏墓志铭》。而其书作，后人不曾见。今本书收录唐谏议大夫兼亳州刺史樊系撰，马瞻造并镌刻之《唐故亳州鹿邑县令韦攸墓志铭并序》，正可一睹马瞻书刻风采。

其他，诸如唐代御史大夫相州刺史薛嵩撰文书丹之《大唐故刘文暉墓志铭并序》、唐尚书职方郎中薛廷范撰，以赋诗“戏答朝士”恶书而闻名于时的诗人李都书《唐殿中侍御史王哲夫人河东薛廷淑墓志铭并序》，皆为宝贵书史之文献资料，不可不引书史研究者所瞩目。

北宋时期，洛阳为西京，王公大臣居洛葬洛者颇多。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宋代墓志二百余方，其中宋代重臣诸如欧阳修、文彦博、王安石、苏澈、王拱臣等名家撰书者不在少数。然而像本书所收录近年科学发掘宋代名相富弼家族墓志，同时出土十四合，且撰书者中，有资政殿学士韩维、端明殿学士孙永。司马光同修《资治通鉴》的范祖禹等众多名家者不多。此撰、书、刻皆为名家所为的墓志出土，无疑为了解北宋时期西京洛阳浓郁的政治文化气息和人文景观，增添了一批重要的实物数据。

余生也晚，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读书期间，方在父亲的亲炙下接触碑版。耳濡目染，深知收藏研究之艰辛。盖余于斯书亦既殚精疲神数十年，其间艰苦扼腕之情，焦虑萦心之态，殆

非尽人所能告语。一纸拓本，有已得之，竟以无力复失去；有获一见，而力不能收，竟听其他售。一纸拓本之得失，每至形至梦寐，数年不能去怀。倘在友人处获观，并欣然得求复印一纸，亦大乐之至。好在父亲已经退休，每至周末，探访碑刻于坊肆间，亦省去余力之大半。凡此千年绝代之碑版，能复归于我乎？求全求备，百年难期，而世事瞬息万变，及今不为及时之纂辑，亦或数年之后，荡为轻烟，虽百身何赎乎？此近千种碑版辛苦艰难之所得，岂易事乎？倘若此碑版之问世，以之前写定史实之说明，亦皆余冥搜苦索之创获，盖为此发见者，自余始。初无所资以取材，辛勤固倍，所获独多。匡正初益，盖有俟于后之君子之所为也。

金石碑版之学，人谓之曰“黑老虎”。此即得一佳拓之不易，往往斥半月粮，具大决心，始获得一二种。岂富商大贾，以饰壁壮观者所能知其甘苦！殆如猩猩血、缕缕滴滴而出。何一非呕心镂肺之所得耶？所欣者，智者亦有所云：书生报国，毛锥同于戈戟。民族精神之寄托，唯在文化艺术之发扬，历劫不磨。文事精进，乃可卜民族前途之伟大光荣，我心无悔！